

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湛余鸿, 袁梦萍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摘要

乾嘉时期是题红诗的首个高峰期。这一时期题红诗的传播载体以别集刊本与手稿抄本为主, 传播范围限于宗室、师友等私人圈子, 传播速度缓慢, 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鸿沟。本文以永忠、明义、周春、吴兰征等人的题红诗作为核心案例, 从传播载体、创作主体、接受特征三个维度, 考察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与接受, 揭示其私藏酬和、滞后传播的特征, 并探讨这一特征在《红楼梦》传播史上的独特位置。

关键词

乾嘉时期, 题红诗, 传播, 接受

A Study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Poem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Yuhong Zhan, Mengping 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2,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Abstract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marked the first peak in the composition of poem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enceforth "Honglou Meng poems" or Tihong Shi).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se poems primarily relied on published collected works and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with circulation largely confined to private circles such as imperial kinsmen, friends, and teachers. The speed of transmission was slow, and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temporal gap between authorship and readership. Focusing on key cases of Tihong Shi by poets such as Yongzhong, Mingyi, Zhou Chun,

and Wu Lanzhe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these poems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ransmission media, creative subjects, and reception characteristics. It reveals the features of private circulation, social exchange, and delayed transmission,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se features in the broader transmission history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eywords

Qianlong-Jiaqing Period, Poem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ihong Shi), Transmission, Recep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红楼梦》本身拥有的文学魅力,吸引众多学者围绕其展开各类研究,由此形成了“红学”。因为研究视角的差异,“红学”分成了题咏派、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流派。题咏派属于较早的流派,包括诗、词、曲、赋、歌等韵文形式的《红楼梦》评论成果。题红诗在学界中暂无统一的界定,在本文当中指的是以《红楼梦》或作者曹雪芹为题材进行题咏的诗歌作品。题红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多数研究将题红诗作为证据去论证其他问题。《乾隆嘉庆之际题红诗研究》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题红诗的创作群体与评点内涵[1]。然而,关于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有作为独立问题的价值。乾嘉时期从时间范围上来看,指的是乾隆元年(1736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但题红诗的创作依托于《红楼梦》的传播,其起始时间略晚于乾嘉开端。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永忠、明义、周春、吴兰征等人为典型案例,依托既有研究成果,从传播载体、创作主体、接受特征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期望对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与接受有进一步的认识。

2. 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形态

乾嘉时期前期题红诗主要来自明义和永忠,实在不算丰富。本文重点关注乾嘉时期 1791~1820 年,因为 1791 年程甲本刊行后,《红楼梦》始有稳定的刊本流传,题红诗的创作亦随之进入首个高峰期。本节将从传播载体、传播范围、传播速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传播载体: 别集刊本与手稿抄本

乾嘉时期的题红诗具有的传播载体主要包括私人的诗文集刊本与手稿抄本。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题红诗无单行本,全部依附于个人别集或友朋传抄,两种载体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传播范围与速度。

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组诗见其《绿烟琐窗集》诗歌选集中,是已知除脂评以外最早的题红诗,就是具体写作时间暂无定论,学界存在争论,但大抵不会晚于 1777 年。此处选取认同范围较广的吴恩裕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以现有的资料推测大概他比永忠小五、六岁生于 1740 年即乾隆五年左右”“曹雪芹死时他大约是二十三岁左右”“《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大约系作者二十岁左右所作,其时约当雪芹死前二三年”[2]。他认为该组诗写于乾隆二十三、四年(1758 年或 1759 年)。章早晨进一步指出,明义二十首题红诗不仅是最早的题咏文献,更可从其内证窥见《红楼梦》早期成书的若干信息,其文献价值远超单纯的咏叹之作[3]。《题红楼梦》符合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主旨要求,同时现在可见的《绿烟琐窗集》来自清朝的抄本,此处题红诗的传播载体即手稿传抄,明义在当时将手稿传给他人抄写,借此进行了题红

诗的传播,于是有了现在流传下来的抄本。

后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曾引用过明义《题红楼梦》的两首诗。他在《随园诗话》中说:“曹棟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羨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4]《随园诗话》是袁枚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前后开始动笔,正编十六卷最早的刊刻时间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此可知,明义的题红诗《题红楼梦》传播到袁枚处,依托的载体可能是手稿或者抄本,但是以袁枚处作为再一次传播的起点,依托的载体变为刊本。我们看到了题红诗得到传播的结果,只是袁枚引用的目的是证“校书尤艳”之说,而非传播题红诗本身。

永忠的《延芬室集》有题红诗《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这三首诗是乾嘉题红诗中传诵最广的作品,但在当时,其传播范围极小。永忠手稿中存弘昉批语于天头:“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5]此处证明永忠的手稿传给弘昉阅读,依托手稿作为载体,达成题红诗的传播路径。同时,永忠为了避祸,《延芬室集》从未刊刻,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叶恭绰发现手稿后方公诸于世。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本文依据吴騫拜经楼本,《阅红楼梦随笔》分为《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五部分,另附有俞思谦七言集古、钟晴初七言集古和徐凤仪《红楼梦偶得》。其中题红诗包括《题红楼梦》与《再题红楼梦》。此抄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周春将题红诗传播给吴騫依托的载体即本身的《阅红楼梦随笔》稿本及吴騫的抄本。根据管庭芬日记,可知他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初七日特别将《红楼梦记》与八首《题红楼梦》七律抄录入日记,认为能“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6]。吴兰征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女性题红诗人,曾撰《绛蘅秋》传奇二十余出,未终稿而卒。后其夫补作二出一并刊刻,为阿英所编的《红楼梦戏曲集》收录。吴兰征是最早将《红楼梦》改编成戏曲的作家之一,也是清代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除《绛蘅秋》外,她还创作了三十六出的《三生石》传奇、《金闺鉴》二十卷和名为《零香集》的诗词杂著稿一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绛蘅秋》一同付梓、编刊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零香集》。学者邓丹在查阅《零香集》中发现了12首题咏《红楼梦》的诗作。《零香集》卷一、卷二为“抚秋楼诗稿”,共收吴兰征诗二百余首。12首咏红诗收入卷一中,依次为《阅红楼梦说部七律四首》《咏林黛玉七律四首》《咏薛宝钗二首》和《咏贾宝玉二首》,中间并未插入其他诗作[7]。吴兰征的题红诗最初仅以稿本形式存于家,后其丈夫俞用济补作未完的《绛蘅秋》,同《零香集》一起刊刻。嘉庆十一年(1806年)她的题红诗传播载体由稿本转换为刊本。

综上所述,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载体主要依托于别集刊本或手稿抄本,无单行题红诗集行世。这种载体形态,从根本上限制了其传播范围。

(二) 传播范围:私人圈子

《红楼梦》在早期传播具有特殊性,只能在“小圈子”里通过抄本进行传播。考虑到《红楼梦》特殊的传播环境,乾嘉时期题红诗也只能传播给少数师友,甚至只有作者自己,不具备“公开发表”条件。

永忠诗末自注“可与我共读之者,其惟宏昉乎”,直接明确指向特定个人。弘昉批语写于诗稿天头,只能基于诗稿作为传播与交流的载体。关于永忠生前是否看到这条批语是不确定的。弘昉批语中“恐其中有碍语也”的顾虑,也说明宗室文人具有政治的敏锐度,对广泛传播会进行自觉回避,局限在私人圈子里。

敦敏《懋斋诗钞》收《赠芹圃》《访曹雪芹不值》等诗。敦诚《四松堂集》收《寄怀曹雪芹霁》等诗。根据敦敏、敦诚的赠诗,可以确定曹雪芹生前与敦敏、敦诚的聚会至少有四次,分别是乾隆十九年

的“虎门”联吟、二十五年的明琳家聚会、二十六年的西郊访芹,以及二十七年的佩刀质酒。在这几次聚会中,敦敏、敦诚兄弟谈及雪芹最多的是其江南家世、不桀的性格和出众的诗才[8]。二人诗作与曹雪芹有直接关联,但集为友朋编定,非为市场刊行,局限在私人圈子。

明义为富察氏后人,与敦敏、敦诚、永忠、墨香等有交游。其《题红楼梦》二十首在圈内偶有传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引用是少有的“溢出”案例。但袁枚引用的动机是证“校书尤艳”之说,而非传播题红诗本身。这恰说明当时题红诗尚未被足够重视传播,只能更多的局限在私人圈子。

综上所述,乾嘉时期题红诗作者本人及读者都没有广泛传播的想法,基于时代局限的客观条件与作者的主观想法,由此让题红诗局限在私人圈子。

(三) 传播速度: 缓慢

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速度极慢,作者与公众读者之间存在数十年乃至百余年的时间差。下表呈现主要案例的传播滞后情况:

案例	创作时间	公开时间	传播滞后
永忠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40年
周春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1933年	139年
明义	约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年)	清后期刊本	约100余年
吴兰征	嘉庆十一年(1806年)	道光年间	约30年

由此表可知,乾嘉时期题红诗的传播滞后并非必然,而是取决于作者是否有刊刻意愿、作品是否刊行。永忠、周春的极端滞后案例,说明当时大量题红诗处于藏于家状态。这种以百年为单位的滞后传播意味着作者只能在私人范围内得到反馈,可能生前根本见不到公众读者的反馈。题红诗的广泛接受发生在作者死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是隔代接受,而非同时代接受,抛开私人圈子小范围的传播,这种公众大规模的传播速度可以说是缓慢。

3. 乾嘉时期题红诗的创作主体

乾嘉题红诗的作者以宗室文人、私家评点者、闺秀才媛为主,写作动机是个人抒情而非公开发表。

(一) 宗室文人群体: 永忠、敦诚、敦敏、墨香

乾嘉时期宗室文人的题红诗具有私密写作特征,无意传播于世。永忠为康熙帝十四子胤禵之孙,终身不得志。其诗“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为后世传诵,但当时可能就弘晬一人得见。弘晬批语中对“碍语”的警惕,恰恰说明宗室文人对传播风险的自觉回避。

敦敏、敦诚为英亲王阿济格之后,与曹雪芹有直接交往。敦诚《寄怀曹雪芹霭》云:“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诗中暗含对曹雪芹身世的关切。但《懋斋诗钞》《四松堂集》均为友朋编定,刊刻范围有限,非为市场刊行。墨香是永忠、敦诚等人的共同友人,永忠诗题中“因墨香得观”即指通过墨香借阅《红楼梦》。

乾嘉时期的题红诗作为证据表明宗室文人作为题红诗的创作主体,同时其承载的价值也不可忽视。

(二) 私家评点者: 周春、徐凤仪

周春,浙江海宁学者,乾隆十九年进士。其《阅红楼梦随笔》自序称“暇日漫记”,语气为私人读书笔记,无邀人商榷之意。其“本事题红”将贾宝玉解释为纳兰容若,是“索隐派”的开山之作。

徐凤仪是另一位私家评点者。其《红楼梦偶得》附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之后,中有题红诗数首。徐凤仪与周春是否有直接交往,文献无考,但其稿本通过吴騫拜经楼得以保存。这说明乾嘉题红诗的传播

播路径往往是稿本 - 抄本 - 藏书家 - 后世, 作者在世时难见公众反响。

(三) 闺秀才媛: 吴兰征、熊琏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 学界对清代女性题红诗的认识正在持续深入。张建雄在前人基础上新增清代女性《红楼梦》题咏者 30 余家, 指出清代女性题红诗以对女性人物命运的关怀为绝对主体, 且集中体现出清代女性环绕《红楼梦》的生活化社交与时代性风俗[9]。吴兰征是乾嘉时期女性题红诗人的代表。其《零香集》是女性题红诗较早的存世案例, 书中有《咏林黛玉七律四首》《咏薛宝钗二首》和《咏贾宝玉二首》等题红诗, 体现了女性读者对《红楼梦》人物的深切共鸣。吴兰征的题红诗创作于闺阁之中, 生前传播范围限于夫家亲友, 属于家庭吟咏性质。

熊琏, 字商珍, 号澹仙, 江苏如皋人。其《澹仙词钞》中有《满庭芳·题十二金钗图》, 词云: “日暖花梢, 香飘帘幕, 十分春在红楼。传杯满酌, 笑语不知愁。试问偎红倚翠, 东风里、谁最温柔。都猜是、个依情绪, 偏是古人忧。”此词虽题画而作, 但已流露出对红楼女儿命运的关切。熊琏身世坎坷, 幼字陈生, 后陈生得废疾, 翁请毁婚, 熊琏坚不可, 卒归于陈。其人生经历与红楼薄命女子颇有相似之处。

(四) 写作动机的共性: 无“公开发表”意图

乾嘉题红诗的作者, 无论是宗室文人、私家评点者还是闺秀才媛, 均不具备公开发表的写作意图。永忠诗写给墨香、弘旻, 周春随笔写给自己, 吴兰征诗存于家, 他们的读者预设是具体的个人, 甚至只有自己, 而非抽象的公众。

4. 乾嘉时期题红诗在接受特征

乾嘉时期题红诗在接受是单向抒发、无即时反馈的阅读行为, 读者很少与作者形成互动, 互动行为发生在私人圈子。接受形态大致可概括为读到写的单向流程: 作者读完《红楼梦》→有感而发→写成题红诗→诗作藏于家或收入别集→流程结束。没有广泛“写-传-回”的完整传播链。

(一) 读者反馈机制: 无或极其有限

乾嘉时期题红诗缺乏同时代的公众读者反馈, 题咏者与公众读者之间存在时间鸿沟, 一般发生在私人圈子。

弘旻批语写于诗稿天头, 永忠生前是否看到这条批语, 无考。这是乾嘉题红诗接受中罕见的读者反应案例, 但其私密性恰恰说明: 反馈只能发生在极小的私人圈子, 且难以形成对话。

周春虽有俞思谦等友朋回应, 但范围极小, 且这些回应同样停留于私圈, 未进入公共领域。俞思谦的回应是“认同其本事说”, 而非“商榷其诗作”, 这说明当时题红诗在接受重心在红学观点而非诗歌艺术。

明义题红诗无同时代人的唱和记录。明义本人是否进行唱和邀请, 或者就刻意未进行传播, 未见任何文献支持。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引用, 是单向的采录而非双向的唱和。且袁枚误将红楼人物解为“校书”, 恰恰说明当时对《红楼梦》的了解尚不深入。

吴兰征题红诗无同时代人的唱和记录。其《绛蘅秋》传奇在道光年间刊刻后, 始有后人题咏, 但此时吴兰征已去世多年。

(二) 接受形态: 单向抒发

乾嘉题红诗是读完之后的个人情感凝结, 而非对话邀请函, 这个情感发生的过程偏向私人, 能进行小范围传播已属幸运。

永忠“传神文笔足千秋, 不是情人不泪流”是抒情, 不是商榷。诗中“可恨同时不相识, 几回掩卷哭曹侯”一句, 已将接受过程彻底个人化: 永忠读曹雪芹之书, 哭曹雪芹之人, 但这个“哭”发生在私人阅读空间中, 没有邀请任何人共哭。

明义二十首咏红诗, 多为对人物情节的吟咏, 如“怡红院里斗娇娥, 娣娣姨姨笑语和”更多的是赏玩, 不是评点。明义对黛玉、晴雯等人的吟咏, 属于读后有感, 而非邀人评议。其第十八首云: “伤心一首葬花词, 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 起卿沉痾续红丝。”此诗虽流露补恨之意, 但仍是个人愿望的表达, 未形成公共讨论。

周春“闲窗偶读《石头记》, 细玩其中味最长”是读书笔记, 不是学术论文。周春的“本事说”在后世被视为索隐派开山, 但当时他只是在闲窗下偶读细玩, 并未邀人讨论。

吴兰征“写到酸心最凄绝, 颦儿还是再来人”是闺中自况, 不是公共言说。诗中“颦儿还是再来人”一句, 包含深切的自我投射, 但这种投射是私密的, 未进入公共讨论空间。

(三) “滞后接受”的红学史意义

乾嘉题红诗的滞后接受, 恰是《红楼梦》从禁书走向经典的传播史缩影。因为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所有即使是晚来的回应, 任然值得被现在的我们看见。

永忠诗作于 1768 年, 1908 年方被发现, 此时《红楼梦》早已家喻户晓, 红学已成一门学问。永忠的知音之叹, 在他死后百年才被倾听。叶恭绰发现永忠手稿时, 距程本刊行已 117 年, 距永忠去世已 115 年。永忠期待的那个“可与我共读之者”, 终究没有出现在他的时代。

周春的“本事题红”提出于 1794 年, 1933 年方刊行, 此时索隐派早已蔚为大观, 周春作为“索隐派开山鼻祖”的身份, 是后世追认的。周春生前, 其说仅俞思谦等少数友朋知晓; 周春死后百年, 其说方广为人知。

综上所述, 乾嘉题红诗的广泛接受普遍发生在后世, 而非当时。它们是寄给未来的诗, 其公众读者是隔代的红学研究者, 而非同时代的文人圈。这种滞后接受的特征, 恰恰说明乾嘉时期尚未形成题红诗传播接受的完整生态, 作者写完, 流程即结束; 公众读者的反应, 要等百年之后方至。

5. 结语

本文旨在梳理乾嘉时期的题红诗在当时产生之后发生怎样的传播和接受。首先, 乾嘉题红诗以别集刊本与手稿抄本为主要传播载体。明义《绿烟琐窗集》永忠《延芬室集》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吴兰征《零香集》均以抄本或稿本形式存世, 流传极稀。永忠诗传播滞后 140 年, 周春随笔滞后 139 年, 这种长期的滞后传播, 是乾嘉题红诗传播形态的极端呈现。其次, 乾嘉题红诗的创作主体以宗室文人、私家评点者、闺秀才媛为主。永忠、敦诚、敦敏代表宗室圈层的私密唱和; 周春、徐凤仪代表私家考证的未刊传播; 吴兰征、熊琏代表闺阁才媛的家庭吟咏。他们均不具备公开发表的写作意图, 读者预设是具体的个人甚至只有自己。然后, 乾嘉题红诗缺乏同时代的读者反馈, 接受形态为单向抒发。永忠诗仅有弘昉一人的批语, 且批语写在稿边, 作者是否得见无考; 周春随笔虽有俞思谦等友朋小范围传抄, 但未进入公共领域; 明义、吴兰征等人无同时代唱和记录。读者无法与作者形成互动, 题红诗的接受发生在作者死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乾嘉题红诗的传播接受史, 本质上是《红楼梦》从文人案头走向公共领域的前夜。它们是被时代延迟接受的声音, 也是后世得以窥见早期读者反应的珍贵窗口。正如陈欢所言, 题红诗至少具有史料价值、评论价值和文学价值。在“史”的方面, 题红诗与《红楼梦》的传播紧紧相连; 在“论”的方面, 题红诗打破了长文评论的沉闷空间; 在“文”的方面, 题红诗有诗意醇厚的不俗之作。题红诗的文献发掘至今仍有新的发现, 如《红楼梦学刊》2024 年第 4 期即报道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朱瓣香《读红楼梦诗》钞本, 表明这一领域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10]。它们静静躺在稿本、抄本、藏家的书箱里, 等待百年后被后人发现、阅读、研究, 就像曹雪芹等待他的知音, 永忠也在等待, 周春也在等待, 许多人都在等待。而这份等待本身, 或许就是乾嘉时期题红诗最动人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陈欢. 乾隆嘉庆之际题红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集美大学, 2010.
- [2] 吴恩裕. 曹雪芹丛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3] 章早晨. 由明义二十首题红诗看《红楼梦》的成书[J]. 中国诗学, 2024(1): 183-193.
- [4] 袁枚随园诗话[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 [5] 爱新觉罗·永忠. 延芬室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 管庭芬. 管庭芬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7] 邓丹. 新发现的吴兰征 12 首咏红诗[J]. 红楼梦学刊, 2008(1): 42-51.
- [8] 顾斌.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探析[J]. 曹雪芹研究, 2015(1): 125-133.
- [9] 张建雄. 清代女性《红楼梦》题咏与价值新论[J]. 红楼梦学刊, 2024(4): 250-270.
- [10] 刘阳河. 新见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朱瓣香《读红楼梦诗》钞本考述[J]. 红楼梦学刊, 2024(4): 233-249.